

转型与发展 第1辑

#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理论与实证

□ 主编/李友梅 孙立平 沈原

-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  
----- 孙立平
- 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 塞勒尼 伊亚尔 唐恩斯利
- 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  
----- 李静君
- 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像  
----- 李春玲
- 工人阶级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阶级妥协  
----- 埃里克·奥林·赖特



转型与发展 第1辑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No.1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理论与实证

□ 主编/李友梅 孙立平 沈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理论与实证/李友梅, 孙立平, 沈  
原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

(转型与发展 第1辑)

ISBN 7-80190-922-4

I. 当… II. ①李… ②孙… ③沈… III. 社会结  
构-研究-中国-现代 IV. D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8486 号

转型与发展 (第1辑)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理论与实证

---

主 编 / 李友梅 孙立平 沈 原  
主编助理 / 吕 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易 之  
责任印制 / 同 非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20.75  
字 数 / 333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7-80190-922-4/D·278  
定 价 / 38.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发刊词

经过不短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转型与发展》第一辑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转型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具体地研究社会转型的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将转型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来洞悉在转型时期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广泛社会现象。

转型社会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一种文明及其历史性的变迁。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

社会学的诞生与第一次大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始终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它的起源、它的价值基础和逻辑前提、它的运行机制以及它的未来和命运。比如，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整合机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社会学的基本母题。而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来源。

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无疑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转型与发展》的第一辑就将社会分层作为集中探讨的主题。

本辑中有关文章的内容不再复述，但有一点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在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时候，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分层的模式，二是阶级的模式。阶级的模式与分层的模式有着重要的差别。

首先，阶级表明的是以一种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位置。如资产阶级可以理解为对经济资本的占有，中产阶级可以理解为对人力资本的占有。而分层模式依据的是结果而不是群体的结构性位置。同样的50元，是工人得到的工资还是资本家的经营利润，在分层模式那里是没有区别的，而在阶级模式那里，区别是根本性的。

其次，阶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即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如正是在相对资本家的关系中，才能更充分体现工人的特征，反过来，也正是在相对于工人的关系中，资本家的特征才能更充分体现出来。而不同阶级之间的某种实质性关系，如剥削，也只有在不同阶级的关系中才能发现和解释。

第三，阶级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载者。通常我们可以说某个阶级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与上述结构性位置有逻辑的联系，而“层”很少有与上述结构性位置相联系的共同利益。“层”即使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利益，一般也不是在上述相对关系中凸现的。依此观之，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户不是阶级，而资本家是阶级。

第四，阶级的内部是相对同质性的，也就是说，分化不能太大，而且内部要存在一定程度的整合和自我认同，后者为阶级意识。而“层”不必然涉及整合和认同的问题。

第五，阶级可以是行动的主体，而“层”基本不会成为行动的主体。所以人们通常会说阶级在行动，而不会说阶层在行动。阶级行动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阶级的行动，二是有阶级背景的利益群体的行动。但利益群体不一定与阶级相联系，如城市中的拆迁户，就可能包含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成员。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辑发表了几篇有阶级模式背景的书评。

# 目 录

发刊词 ..... / 1

## 转型·分层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 ..... 孙立平 / 1

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

资本主义 ..... 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 / 36

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 ..... 李静君 / 55

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像 ..... 李春玲 / 89

工人阶级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利益

和阶级妥协 ..... 埃里克·奥林·赖特 / 114

## 城市·乡村

基层社区研究提问法及其变化 ..... 李友梅 / 155

城市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差异及其原因 ..... 张翼 / 176

从耐用品消费看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

——以深圳为例 ..... 赵尉华 / 208

企业化村落、产权残缺和人情信用

——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 李培林 / 233

乡镇政府债务：规模结构、形成机制、风险效应

及其治理 ..... 谢子平、宋洪远 / 257

书评·述评

《世界的苦难》：它的缘起、观点与方法 ..... 毕向阳 / 282

工人阶级的失语

——读《工人阶级经验的现象学研究》 ..... 郑广怀 / 298

无声的底层与底层的声音

——“底层研究”述评 ..... 秘舒 / 305

稿约 ..... / 322

#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

孙立平\*

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 Parish, 1984）社会的话，那么，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则出现了一个再分层化（restratification）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社会分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社会分层结构的状态与演变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的新趋势。本文力图表明，在社会资源配置从扩散转变为重新积聚的背景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两极社会基本形成，社会结构出现多方面断裂，一套原来未曾有过的社会生活运作逻辑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妥善协调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也许是可以调节阶层关系的可能制度选择。

## 一 资源重新积聚与财富格局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

---

\*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此外几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也都与之大体相似。按照世界银行的想法，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情况还会继续恶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以如此快的速度迅速扩大？无论是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中还是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对资源的占有都是分层结构形成的基础。在上个世纪90年初中期，我们曾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提出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形成——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分析框架（孙立平、王思斌、杨善华、王汉生、林彬，1994；孙立平，1992、1994）。因此，要说明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大的事实，必须对社会中的资源配置状况及其变化进行详细考察。

#### 1. 20世纪80年代：资源的扩散

如同苏东的改革一样，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改革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当时在苏东和中国进行的多项调查研究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在缩小（Nee, 1989；Rona-Tas, 1994）。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源于“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失败者形成之前先行造就成功者。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是再分配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资源的扩散，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分层结构）的一系列重要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1978~1985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397.6

元，平均每年增长16.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15.2%<sup>①</sup>；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的，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体来说，这些人数量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

<sup>①</sup> <http://www.jlagri.gov.cn/old/zjzx-0041.htm>

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 2.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的重新积聚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资源聚敛过程开始发生。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和分布的格局，以及社会分层的基本背景，也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由市场机制形成的资本的积聚。根据第四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私营企业户均实有资金150万元，其中超过1000万元的私营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1.0%，超亿元的私营企业占1.46%。由于企业净利润的绝大部分投入再生产，私营企业的资金积累率很高，平均每年达到61.7%。注册资本额户均75.54万元，其中，100万元以上的27.33万户，100万元~500万元的20.17万户，1000万元以上的1.35万户，亿元以上的219户（陆学艺，2002）。而私营企业的发展，在90年代呈现出一种加速度。到2002年底，我国私营企业已有243.5万户，投资者623万人，雇工2787万，注册资本24756亿元，分别是1989年的27倍、30倍、12倍和295倍（戴建中，2004）。

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独立地发挥作用。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在资源重新积聚的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个过程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聚敛财富的过程得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双轨制。在最初的时候，主要聚敛财富的手段大部分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的形式实现的。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进入更为实质性的阶段。最初是所谓的“圈地运动”。在1987~1992年的“开发热”中，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以极低的价格将土地批给房地产开发商。然后由这些拿到廉价土地的“开发商”在市场上多次转手，谋取暴利。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改制的进行，过去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开始被瓜分。这个数字有多大，是难以统计和计算的。按照有的学者的粗略计算，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此外，腐败也在财富的聚敛上扮演更为实质性的角色。如前所述，在80年代的时候，尽管腐败现象远不是个别的，但在当时，涉及的财富量是相当有限的，因而并不能对整个社会的财富

分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进入90年代之后，腐败现象进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几十万元的案件已屡见不鲜，上百万的案件频频发生，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也时见披露<sup>①</sup>。其结果是，腐败已经成为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构成影响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央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

进入21世纪之后，与市场相伴随的另外一些机制成为加速资源积聚的重要力量。

第一是大型的国际化的采购网络对制造业厂商的盘剥。一双耐克“乔丹五型”的鞋在美国可以卖到120美元以上，但在中国完成的所有加工程序中，总共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一双彪马鞋在美国和欧洲售价70美元左右，付给所有生产这双鞋的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1.16美元，但每双彪马鞋的广告费用就达到6.78美元，是彪马支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6倍。而这样的利润分割格局的形成，是与大型国际化采购网络对小规模加工制造业厂商之间的不对等的谈判地位甚至彼此之间形成的一种支配关系联系在一起。近一段时间，沃尔玛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千方百计压价从而在世界各地制造了无数的“血汗工厂”的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人形容说，沃尔玛的订单，就如同鸡肋一样，食之无味，抛之可惜。在这种支配关系之下，一些企业似乎只有过分盘剥劳动力才能获得那份并非可观的利润。

二是高新技术的高额利润。最近的一则消息说，联想和方正这两个中国最大的电脑生产企业准备大规模弃装视窗软件，而弃装的基本原因无疑

<sup>①</sup> 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盗用中国银行资金炒汇和转移到海外共4.83亿美元，约合40亿人民币；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将4.2亿元转移海外；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受贿人民币517万元，来源不明财产达人民币480万元，涉案总数额达997万元，平均每天收受6000多元；深圳市工程咨询公司处长王建业受贿、侵吞公款人民币1300万元；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挪用公款1亿元人民币、2500万美元；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长青贪污、挪用公款6000万元等。

是价格。联想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由于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价格昂贵，加上竞争对手也经常不预装，所以这次联想也只能推出没有视窗操作系统的“光头”电脑。其实，多年来，在IT界就流传一种说法：电脑厂商都是在为微软和英特尔打工。因为芯片和操作系统的价格几乎占了一台电脑成本的一半左右。有消息说，WINDOWS98卖了近8年，赚的钱已经足够再研发40个WIN98。高新技术行业所拥有的高额利润无疑意味着对制造业利润空间的挤压。

三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配关系。近些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虚拟经济的扩张。到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其中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约为65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柜台交易额约为95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约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相当于实体经济的5倍。在中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也达到了1:1。虽然在一个特定企业中很难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意味着什么，但从总体上看，5倍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也是要有利润的，这个利润从哪里来？只能从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中来。狭义的虚拟经济本身是不创造财富的，只是实现财富的转移，包括利润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在虚拟经济已经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支配关系之后，实体经济在利润的分割上会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

上述三个因素无疑为制造业设定了基本的生存环境。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这三个因素的支配和对利润的分割之下，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这种状况势必会进一步影响到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以及劳动力的权益。因此，在讨论劳工权益的时候，尽管资本的本性以及劳动力的供给状况甚至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都是不可否认的，但对上述经济背景决不能加以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开始重新向少数人或社会群体积聚。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如前所述，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十几年

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这特别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sup>①</sup>。

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更是负债累累。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的乡镇基层债务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预计达2500亿元<sup>②</sup>。

## 二 从资源配置到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失控

### 1. 贫富差距扩大的程度加大，而且在继续恶化

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但超过0.4就算进入警戒状

① 从正常的个人收入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幅明显小于80年代的增幅，而同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变化。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幅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为10.2%（名义，下同），在之后的四年里连续下降，1994年为8.8%，1995年为4.9%，1996年为3.3%，1997年基本上与1996年持平，为3.4%。“八五”时期，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5%，远低于同期人均GDP10%左右的增长速度；199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而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大幅度回落，仅增长4.6%，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估计只能增长2.5%。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正常的收入分配只是全部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有限的部分。财富的聚敛，更多是表现在无法准确统计的非正式途径上。

② 《财经时报》2004年04月04日。

态 (Warn), 达到 0.6 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 (Danger)。

数据表明,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 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 0.1 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 中国的基尼系数 1999 年为 0.457, 2000 年为 0.458, 2001 年为 0.459, 2002 年为 0.460。这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一项研究预测表明, 未来五年,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期, 但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一方面中国“入世”之后, 外资、外企与内资、内企的人才争夺战会愈加激烈, 高素质人才的收入会迅速提高。另一方面, 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 加上城镇失业率的上升, 致使普通劳动者供大于求, 收入水平难以提高<sup>①</sup>。

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 同时也反映在财富的占有上。根据樊纲教授提供的数字, 截至 2000 年底, 我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 38 万亿元。在这当中, 国有资产占 26%, 国内居民个人拥有 57%, 另外, 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在金融资产中, 包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 政府、企业、住户拥有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18.6%、31.7%、49.7%。也就是说, 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 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但这种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在 20 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 80% 为占总人口 30% 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 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 20% 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也就是说, 占总人口 6% 的人占有了 40% 的金融资产<sup>②</sup>。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证明了这种财富拥有格局的存在。不过, 另外一些调查表明, 财富的集中程度要更高。比如, 一项在 1999 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 不足 5% 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 6 万亿元的一半, 即 3 万亿元人民币。

2003 年, 人均年收入 637 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增加了 80 万人。这在改革二十多年来贫困人口还是第一次出现反弹。这次贫困人口数量的反弹, 固然有种种具体的原因, 如大面积的旱灾, 导致部分地区农民收入的减

<sup>①</sup> 《市场报》2001 年 6 月 17 日。

<sup>②</sup> 《中华工商时报》2003 年 2 月 17 日。

少。SARS 的流行直接影响到贫困农民进城务工的数量和收入。但除了这些偶然性的因素之外，是近些年来农民增收的困难。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97~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90.13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4元，同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分别为4.6%、4.3%、3.8%和2%。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但这还是平均数字，里面包括了个别“高收入户”的独特贡献。在平均数字的背后，实际上很难有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是增加的。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户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二是在乡镇企业做工的收入，三是在外地打工的收入。首先，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下降了30%~40%，在农副产品的总量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农民从出售农副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应当是减少了的；其次，近些年来，许多乡镇企业开始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净减少了2000万人，在其仍然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从这个途径获得的收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大面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将这三个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除此之外，据专家测算，我国城市中的实际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可能达到4000万~5000万人。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中的一部分开始沦为城市贫困人口。

## 2. 贫富差距的扩大出现失控趋势

在最近的几年中，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以遏制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发展。但从效果上来说，预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贫富悬殊的趋势仍在扩大。可以说，目前我国贫富悬殊的趋势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与收入和国民财富分配有关的制度安排处于混乱之中。

第一，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个人手中。2002年，我国GDP首次超过10万亿元大关。我们可以看一看这10万亿元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分配的。第一块是城镇居民在这一年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3.4%。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如果城镇人口按4.8亿人



(2001年的数字)计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3.7万亿。第二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2476元。如果农村人口按8亿人计算,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2万亿。这两块加在一起,为5.7万亿元,占全年GDP的57%。除了这两块之外,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企业的利润。

在这四块中,第一块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时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对这块财富的分配加以认真分析。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又表现在,“工资总额”所代表的劳动报酬在其中所占比例过小。按照统计部门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他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它包括的范围是:①计时工资,②基础工资,③职务工资,④计件工资与计件超额工资,⑤各种奖金,⑥各种津贴,⑦加班工资,⑧其他工资。最近几年“工资总额合计”的情况是,1999年0.987545万亿元;2000年1.065919万亿元,2001年1.18309万亿元。有专家估算,在2002年,全年工资总额大约是在1.2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2002年的“工资总额合计”,只占GDP的12%,占城乡居民全部收入的21%,占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也就是说,在城镇这一块,有2.4万亿元(占城镇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7%)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在2001年,基本养老金大约为2300亿元,低保100亿元,失业保险190亿元。这三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大约为2600亿元)。

第二,不合法的和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使得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一是已有社会财富的转移。这主要是指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向个人手中。可以说,这是过去20年中影响社会贫富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有的学者的计算,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在几千亿元(何清涟,1998)。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则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尽管现在无法对此进行精确计算,但从一个个案可以看出,数额是非常巨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贪污腐败和80年代相比,在社会结果上是很不一样的。在80年代的时候,虽然也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但当时的贪污腐败还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产生根本影响。但现在数额巨大的贪污腐败和瓜分国有资